

全美畅销书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精英的反叛

克里斯托弗·拉希 ◎ 著

美国最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

李丹莉 刘爽 译

当精英分子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争执不休时，他们不敢面对的真相是：
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教育的失败；

当特权阶层为了一己私利而枉顾大众福祉时，他们不敢承认的事实是：
民主和平等成了粉饰太平的谎言。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克里斯托弗·拉希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这本书短小精炼、论述严密，是我们时代最后一部极具美国思想家特色的作品。

詹姆斯·诺思
《芝加哥论坛报》

《精英的反叛》是拉希对当代重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力作，展现了他深入浅出的朴实语言以及与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风格。

迈克·斯特恩
《旧金山新闻》

政治分析家们一直忙于进行选举后的民意调查和选票研究，以了解大选的意义，但是，他们如果把时间用于阅读克里斯托弗·拉希的这部遗作，可能更有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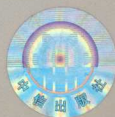
约翰·朱迪斯
《华盛顿图书邮购大世界》头版书评

《精英的反叛》充满了我们重振美国民主所需要的公共话题，每次读上两章真是一种享受。打开书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坐在1774年波士顿的一家小酒馆里，这时塞缪尔·亚当斯走了进来，于是对话开始。

沃伦·戈德斯坦
《波士顿环球报》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上架建议◎社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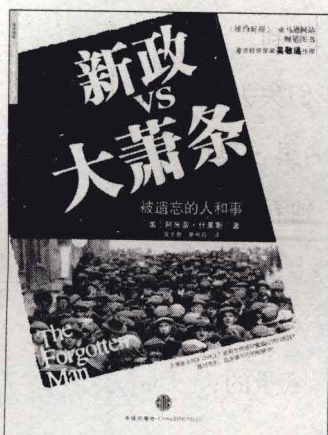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86-1725-1



9 787508 617251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28.00元

美国系列图书



新政 VS 大萧条

尽管美国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在当前全球面临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际，我们感到它并不遥远。

根据一种人所熟知的说法，是罗斯福政府积极实施干预的“新政”，挽救了大萧条的美国经济，继而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拯救了深陷二战硝烟的世界。然而，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书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新政实施五年后，为何美国依然一片萧索，自杀率居高不下？社会主义苏联怎么会成为美国精英的向往之地？罗斯福为什么根据幸运数字确定金价？旨在复苏经济的《国家工业复兴法》因何被裁定违宪？中小企业因为什么瑟缩不前、拒绝投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件背后隐藏着何种真相？权倾一时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如何与民营电力公司争利？现代化的美国怎么走到以货易货的田地，货币被什么蒸发了……

作者阿米蒂·什莱斯是美国知名记者，为了撰写本书，她进行了大量而细致的史料整理，通过揭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被遗忘的历史事实，颠覆了我们对新政和大萧条的传统印象。

读者来信 伊迪丝·金 金碧辉煌 社会不公
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

美国怎么了？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美]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著 刘洪译



美国怎么了？

本书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最新力作。他在书中回顾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深入地探讨了美国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运动”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良影响，呼吁重新展开社会政策的公共辩论，主张政府应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作用，同时警醒世人不要冷漠对待社会不平等议题，以致错失改革良机。

精英的反叛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克里斯托弗·拉希 ◎ 著

李丹莉 刘爽 ◎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英的反叛/(美)拉希著;李丹莉,刘爽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01

书名原文: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ISBN 978-7-5086-1725-1

I. 精… II. ①拉…②李…③刘… III. 社会问题—研究—美国 IV. D771. 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2953 号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by Christopher Lasch

Copyright © 1995 by the Estate of Christopher Lasch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精英的反叛

JINGYING DE FANPAN

著 者: [美] 克里斯托弗·拉希

译 者: 李丹莉 刘 爽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35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57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9-3273

书 号: ISBN 978-7-5086-1725-1/F·1774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 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国外媒体和专家评论

克里斯托弗·拉希毕生致力于为自由、公民的责任和普通民众的良知大声疾呼。他的论著绝对是先知之作：呼唤我们回归民主生活的首要原则并向往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而不会畏惧争论个人和社会选择的道德意义。他能留下这部《精英的反叛》，对后人是一大幸事。这部书既对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的失败进行了剖析，还提出了一个更加负责和富有成效的公众生活发展方向。任何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受到鞭策和鼓舞。

小狄奥尼，《华盛顿邮报》

《精英的反叛》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富有深刻见地的作品。

罗伯特·博克，《国家评论》

本书是对美国民主文化威胁的一次猛烈批判。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周报》

拉希先生在《精英的反叛》中提出了一个富有争议的主题。他指出，很矛盾的是“控制着国际金融流通和信息交流，因此也就决定着公众舆论基调”的中上层精英们，却“对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说所剩无几的西方价值观失去了信任”。

丹尼斯·法尼，《华尔街日报》

在《精英的反叛》中，拉希对美国民主进行了有力批判，并指出了需要一个自由和保守相结合的治疗方案以使其恢复健康。

彼得·斯通，《费城问询者报》

这部目光敏锐的优秀著作，分析了美国追求政治平等的冲动在工作场所和更大文化范围内遭受的失败。

保罗·鲍曼，《新闻日报》

作者语言精辟、切中要害，他的书让人忍不住要大声朗读给朋友们听。

《书目》

克里斯托弗·拉希的这部遗作让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具有讲真理的能力，他能用平实的语言道出精妙之处，去挑战许多美国特权阶层自以为是的那些观点。即便你不同意书中的观点，它也确实是一部重要而让人不能平静的著作。

莱昂·波茨坦，巴德学院院长及美国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致 谢

由于这本书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所以我更加感谢那些给我建议和帮助的人们。我女儿 Betsy 放下自己的工作，为我打字并在编辑方面给了我大量宝贵意见。Suzanne Wolk 为了输入大量手稿，也牺牲了她自己的工作。我妻子 Nell 在我这么大年纪教我如何使用文字处理器，没有她的指导我不可能会使用这个机器；而没有这个机器的帮助，我也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此外，她还费心为我校稿并修改非常不成熟的初稿。

Robert Westbrook、Richard Fox、William R. Taylor、William Leach 和 Leon Fink 审读了全部和部分手稿，还有其他人在我艰难的时刻读了我的文章并给了我许多鼓励。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 Henning Gutmann，他给了我大量有益的建议和鼓励。

这本书的某些章节曾在以下刊物上发表过，其中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发表在《新共和》杂志；第四章和第十二章发表在《新牛津观察》(*New Oxford Review*)；第六章在《梯坤》(*Tikkun*) 杂志；第五章在《匹兹堡历史》(*Pittsburgh History*) 期刊；第八章在《盖耐特中心杂志》(*Gannett Center Journal*)；第三章和第九章在《杂集》(*Salmagundi*) 杂志；所有这些文章都经过了大幅修改。因为它们大部分都发表于名不见经传的舆论刊物，我相信大部分读者都没有读过。

目录

CONTENTS

导 论 民主的问题所在 / 1

第一篇 社会分化的加剧

第一章 精英的反叛 / 19

第二章 应许之地的机会：社会流动性和能力的民主化？ / 37

第三章 民主值得继续存在吗？ / 59

第四章 社群主义还是平民主义？同情的伦理和尊敬的伦理 / 68

第二篇 江河日下的民主讨论

第五章 对话和公民艺术 / 87

第六章 纽约的种族政治：对共同标准的攻击 / 96

第七章 公立学校：霍勒斯·曼和对想象力的破坏 / 105

第八章 失传的辩论艺术 / 119

第九章 学术的伪激进主义：“颠覆”的字谜 / 130

第三篇 灵魂的暗夜

第十章 羞耻感的泯灭 / 145

第十一章 菲利普·里夫和文化的宗教 / 157

第十二章 世俗主义下的人类灵魂 / 169

导 论

民主的问题所在

我最近的大多数作品都从不同角度回归到探讨民主是否还有前途的问题上，我想有许多人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如今的美国人对未来远不如以前那样乐观了，而且有了更充分的理由。诸如制造业的没落及其导致的失业率升高、中产阶级萎缩和穷人日益增多，犯罪率不断上升及毒品的泛滥，还有城市持续衰败等各种各样的坏消息层出不穷。这些棘手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之道，大部分政治议程也没有将这些问题列为解决对象。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界定这些问题的精英们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见第一章）。我们的政治不切实际而且矫揉造作，这既是其脱离日常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显示出人们心底的一种信念，即真正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当乔治·布什第一次在超市的收款台看到电子读码器时，他感到非常吃惊。他的惊奇就像一道闪电划过，凸显出特权阶层和其他国民之间的鸿沟。特权阶层始终存在，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特权阶层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危险地脱离它所处的环境。在 19 世纪，富裕家族通常是几代人固定生活在某一区域。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这些家族固定的居所显示出了一定的延续

性。古老的家族（尤其是在较早的海滨城市）之所以得到尊重，就是因为他们逆势而行，拒绝迁徙而选择扎根于斯。他们对私有财产神圣权利的坚持是有限制的，即财产权既非绝对的也非无条件的。拥有财富意味着要承担公民义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管弦乐队、大学、医院和其他公益设施便是上层阶级慷慨济世的诸多功德碑。

这种慷慨无疑有着自私的一面：它彰显了富人的阔绰，招徕新的产业，同时又帮助提升本城市相对其他城市的竞争能力。在城市渴望繁荣发展的激烈竞争时代，“人人有责”的公民责任感的确是好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慈善事业意味着精英们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并影响着下一代的生活。精英们总想回到自己封闭的世界中，却受到一种意识的阻碍，这种意识挥之不去，即便是在极度自我放纵的镀金时代某些人群仍无法忘怀。正如霍勒斯·曼（Horace Mann）于1846年所说的，“每个人都受惠于祖先”，因此“人人都有责任把这些恩惠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只有“离群索居、孤立存在的人”才会承认“绝对所有权的傲慢信条”。这不仅代表霍勒斯·曼一个人，也代表了许多古老城市、大部分新英格兰地区 and 老西北地区的新英格兰文化附属地的相当一部分舆论。

由于古老家族的没落及其公民责任感的消退，人们对本土乡里的忠诚感也就令人痛惜地一去不返了。资本的流动和全球市场的出现也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包括从大公司的管理者到所有制造和控制信息的专业人士在内的新精英们（他们是全球市场的生命线），可以说是世界公民，或者至少比他们的前辈更不安定、流动性更大。如今，生意的拓展和职业的发展需要人们听命于机遇的号角，随其来去毫无怨言，那些待在家里的人便丧失了向上的流动机会。成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与流动性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在19世纪关于机遇的概念中，流动性还处于边缘地位（见第二章）。在20世纪，

流动性地位本身就意味着民主理想衰亡的标志，民主的理想不再是希望生存条件的大致平等，而只是希望选择非精英进入专业管理阶层。

有野心的人清楚四处奔波的生活是出人头地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是他们乐于付出的，因为在他们心里，家就是不断有亲戚邻居来叨扰、充斥家长里短的闲言碎语和各种传统习俗的地方。新的精英们反叛着他们想象中的“中产阶级美国”，即一个技术落后、政治反动、性道德压抑、品位低下、自以为是、自满、无聊而庸俗老套的国家。那些渴望跻身新精英行列的人往往离开内陆而聚集在沿海地区，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在这个市场中，资金快速流动，充满了无穷诱惑，时尚和流行文化变幻不定。他们是否还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都令人怀疑。在他们心里，爱国主义当然算不上名列前茅的美德。另一方面，他们心仪的“多元文化”让人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全球大市场的惬意景象，流连其间你可以品尝到异国风味的佳肴，欣赏到异域风格的服饰和音乐，体验异域部落的风情，这一切令人眼花缭乱，但你却不需要问任何问题也不需要有任何奉献。这些新精英们总是人在旅途，去参加高级会议和新店的开张典礼、出席国际电影节或者去一个不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等，他们只有在奔波间隙才回家看看。他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态度基本上与旅游者无异，这种态度不可能让他们对民主有任何奉献。

在《真正与唯一的天堂》一书中，我曾尝试重拾被弃置不用的一种民主思想传统，我称其为平民主义（因为找不出更好的词）。让我吃惊的是，一位评论者抱怨说书中内容根本没有谈及民主（我想这应该是我在第三章中给人造成的误解）。他会如此错误地领会我在书中的观点，反而使我们对目前的文化环境有所窥见。这说明我们对民主含义的理解是多么模糊，我们与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偏离得多么遥远。这个词现在只是用来描述美国社会的病症。今天当我们提到民主时，我们经常是指“自尊”的民主化。诸如多样

性、同情、授权和权利等现今的这些时髦词语，只不过表达了一种渴望，即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严重分歧是可以通过善意和净化的语言来消除的。我们必须承认所有少数族群都享有受尊重的权利，不是基于他们的成就，而是由于他们过去所遭受的苦难。我们被告知，我们对他们的同情之举会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他们的自信，禁止使用种族歧视语言和其他仇视言论会鼓舞他们的士气。我们只注重了语言的使用，而没意识到只提升人们的自我形象不可能缓解严峻的现实。在知名大学里实施语言管理条例，对南布朗克斯区的居民能有什么帮助呢？

19 世纪上半叶，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认为民主必须以财产的普遍分配为基础，他们清楚贫富的两极分化会危及对民主的实验。他们对下层民众之所以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有时候会被误解为势利的鄙视），是因为他们认为劳动阶级既屈从又不满，不具备作为民主公民所应有的思想和品质。他们认为民主习惯（democratic habits），比如自立自强、有责任感和进取心，只有在小规模的财产交易和管理实践中才能养成。他们所称的“能力”既是指财产本身，也是指管理财产所必需的知识 and 事业心。因此，只有在公民中尽可能普遍分配财产，民主才能发挥到极致。

更概括地说，当世间的男男女女不是靠政府而是在朋友和邻里的帮助下为自己谋利时，民主才能真正实现。民主不应该与粗鲁的个人主义画等号。自立自强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正如我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所说的，民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自治的社群而不是个人。正是这些社群的没落使民主的未来令人担忧。市郊的购物中心不能替代社群。各城市竞相采用同样的发展模式，也相继遭遇同样令人沮丧的结局。随着人口向郊区的迁移，产业和就业机会也涌向郊区，使城市陷入赤贫状态。由于税收萎缩，公共服务和公众设施也都不复存在。建立大型会议中心和体育场馆来吸引旅游者这种振兴城市

的努力，只会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市场，在豪华的名品店、大饭店和餐厅里展示的奢侈品却是大多数居民消费不起的。于是，为了进入这个被广告渲染为美国梦的光怪陆离的世界，有些居民便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同时，那些与世无争的人则被高额房租、中产阶级向日渐破败的市区移居以及错误的政策排挤得无处容身，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瓦解据说会阻碍民族融合的种族聚集社群。

我所理解的平民主义绝不仅仅是促进农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它所设想的国家不仅属于农民，也属于工匠和商人，它与城市化并非水火不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50年间，城市迅速发展，移民大量涌入，雇佣劳动日趋制度化都曾给民主带来严峻的挑战。但是，如简·亚当斯（Jane Addams）、弗雷德里克·豪（Frederic C. Howe）以及玛丽·福利特（Mary Parker Follett）等城市改革者，则相信民主制度能够适用于城市生活的新形势。豪抓住了所谓的进步运动的实质，他称城市是“民主的希望”。城市的社群似乎重建了19世纪小镇生活中实行民主的各种条件。城市创立了自身特有的社团形式，尤其是工会和生机勃勃的市民精神。

那些本土保护主义的政客们常常利用城乡冲突，把城市描述成罪恶的渊薮。然而，这种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虚幻不实的。有识之士一直认为城乡之间互为补充，两者间的健康平衡是建立美好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城市变成了大都会，才打破了这种平衡。当人们聚居的主要形式不再以城市或农村来划分，更不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一种无序扩张、无组织聚合，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界限、公共空间或市民身份差异时，城乡之间的差异便毫无意义了。罗伯特·菲什曼（Robert Fishman）指出，将这种新的模式称作市郊可能已不合适，因为以前的城市附属地区现在却取代了城市的大部分功能。作为大型律师事务所、广告公司、出版公司、娱乐行业以及博

物馆的所在地，城市还残存着它的重要性，而那些支撑着富有活力的市民文化的中产阶级社群正在快速消失。仅仅作为残余存在的城市越来越两极分化。中上层阶级的专业人士以及为满足其需要的服务业者在高房租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努力避免陷入贫困或被卷入犯罪行为。

所有这一切对民主都是不祥之兆，而一想到公共辩论的退化，前景就更暗淡无光了。民主需要观点和意见的激烈交锋。如同财产分配一样，观念也需要广泛传播交流。然而，许多自诩的“人杰们”却一直怀疑普通公民是否具有理解复杂事务，并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在他们看来，民主的辩论极易演变成大喊大叫，而很少听到理性的声音。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睿智的霍勒斯·曼却没有意识到，政治和宗教争论本身就具有教育意义，并试图把会引起分歧的问题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见第七章）。他极力想避免宗派纷争的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今公立教育缺乏特色、中庸的、令人厌恶的现状或许就是他的遗风吧。

美国的新闻界对普通民众的论证能力也始终抱有成见（见第八章）。现代新闻界先驱之一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在专业化时代，“全能公民”（omnicompetent citizen）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实质都关注甚少。新闻界的任务不是鼓励公众辩论，而是给专家提供有关信息以作为明智决策的依据。与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其他进步运动宿将观点不同的是，李普曼认为公众的意见只不过是纤弱的芦苇，他们意见的形成不是基于理性的判断，而是情绪所致。“公众”这个概念本身就令人怀疑。被进步主义者理想化的“公众”、能对公共事务给予明智指导的“公众”，只不过是“幻影”而已，它只存在于那些多愁善感的民主人士心里。李普曼写道：“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仅限于此，应该有规章制度……公众感兴趣的是有无法律，而不是有哪些法律；是

法律的方法，而不是法律的实质。”实质问题应该留给专家来解决，因为他们拥有科学知识，他们不会像公众辩论那样受情绪化的“符号”和“陈规老套”的主宰。

李普曼的论点是建立在“意见”和“科学知识”的明显差异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只有后者才具有客观性，而“意见”却是基于模糊的印象、偏见和一相情愿得来的。这种迷信专业特性的态度对现代新闻界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报纸原本有可能成为市镇会议的延伸，可事实却不然。他们信奉了一个被误导的“客观性”理想，把他们的目标定成了要传播可靠的信息，即所谓的信息回避而不是促进辩论。当然，最令人不解的是，由于报纸、电视和其他媒体的存在，美国人已经被淹没在大量信息之中。可即便如此，总有调查报告显示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无知程度有增无减。在“信息时代”，美国人却是出了名的孤陋寡闻。这个表面上矛盾的现象很容易解释，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答案就是大多数美国人被认为无能而无缘于公众辩论，面对如此大量的信息他们会应接不暇、全无招架之力。他们几乎真的成了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无能，但是这也提醒我们：辩论，只有辩论，才能让人了解有用的信息。没有民主的观点交锋，大多数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掌握知识从而使自身成为有能力的公民。

关于“知识”和“意见”的差别的有误导性的争论最近又出现在大学校园中，虽然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仍引起了很大轰动（见第九章）。这些争论尽管激烈但毫无结果，因为双方持有同一个未公开承认的前提：只有无可争议的知识才可能有影响力。某个左翼派别（尽管它的观点与其声称为之辩护的传统没什么相似之处）主张，“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的失败使我们第一次认识到知识只不过是权力的别名而已。那些居主导地位的群体（通常指持欧洲中心论的白人男性），把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准则、他们出于

一己私利而对历史的解读都强加在别人身上。他们足以压制其他竞争性的观点，从而断言自己这种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普遍而超验的真理。学术左派（academic left）的观点认为，对基础主义的严厉批判，暴露了那些主张不过徒有其表，也使无权无势的群体能够挑战盛行的正统观点，因为它的作用无非是让妇女、同性恋和“有色人种”等乖乖听命罢了。因为推翻了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少数派便能够用自己的世界观取而代之，或者至少保证对其他意识形态的研究，如黑人研究、女性研究、同性恋研究、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和其他“另类”研究有同等地位。一旦知识等同于意识形态，也就没有必要在理智的基础上与对手辩论，或者了解对方的观点。只要给他们定性为欧洲中心论者、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同性恋歧视等等，换句话说，将他们都打成政治嫌疑犯就足够了。

对西方文化被扫地出门，大学里保守的批判者们心里自然不好受，但是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诉诸如下假设（这个假设的不成立招致了对古典文化研究的攻击），即承认某些公理式的原则是可靠知识的先决条件。不幸的是，对这些批评者来说，那些曾经看似为可靠的思想结构奠定了牢固基础的绝对真理，如今已经不可能复兴。当笛卡儿尝试用不容置疑的命题来构建哲学之时，对“确定”的追求就已误入歧途，最终沉溺于现代思潮，使之变成了现代思潮中的一种强迫症。正如约翰·杜威所指出的，它偏离了哲学的正务，试图得出“关于实际行为规范中有关目的和手段的具体判断”。哲学家们在探求绝对和永恒时，对有时间限制的、偶然性的事物不屑一顾。如杜威所说，在他们眼里，“实践活动”变成了“本质上的劣等事情”。在西方哲学的世界观里，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心理与身体都是割裂开来、互不相干的。

这种传统的残余影响正是大学保守派批评的特色。保守派认为，只有基础主义才能驳斥道德和文化的相对论。如果知识不是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

那么世间男女便可胡思乱想。“万物瓦解，中心难存；泛滥世界，仅存混沌”，保守派不厌其烦地引用叶芝（Yeats）的诗句来说明公理式原则失去权威的后果。然而，学术界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牢固的基础，而在于他们深信一旦缺乏这些基础，就只会导致怀疑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实际上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这一点杜威非常清楚），而且实用主义又重新成了历史学和哲学的研究对象（如同灰暗画面里不多的一笔亮色），让陷入困境的学术界绝处逢生。

对“知识确定性”的探求并不只是学术界的兴趣所在，它同样也进入了关于宗教的公众角色的激烈争论范畴。争论双方都固守同样的前提，只是这次的前提是：在无法预测的宇宙里，宗教提供了稳定的磐石。根据宗教批评者的观点，正是传统的知识确定性的崩溃，才使人们不再重视宗教（至少那些逐渐受到现代事物影响的人是如此）。宗教的辩护者也从相同的前提出发进行论证。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套不容置疑的教义，人们便会失去道德方向。善恶几乎没有分别；人们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古老的禁令变成了一纸空文。

不仅是福音派传教士大力宣传这些论点，偶尔还会有世俗的知识分子因为担心道德的混乱无序而随声附和（见第十一章）。这些知识分子因宗教的私人化和宗教事务不再是公众讨论的内容而惋惜，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们的论点因为存在某些缺陷而被削弱了。首先，不能仅仅因为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就要振兴宗教。信仰是发自内心的，不可能招之即来。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期望宗教制定出全面明确的行为规范，从而解决一切纷争和疑问。令人不解的是，正是这个假设导致了宗教的私人化。那些极力让宗教退出公众生活的人认为，宗教信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其信徒相信那些超出理性论证范围的不容置辩的教义。同样，那些怀疑论者也把宗教看作一堆铁的教